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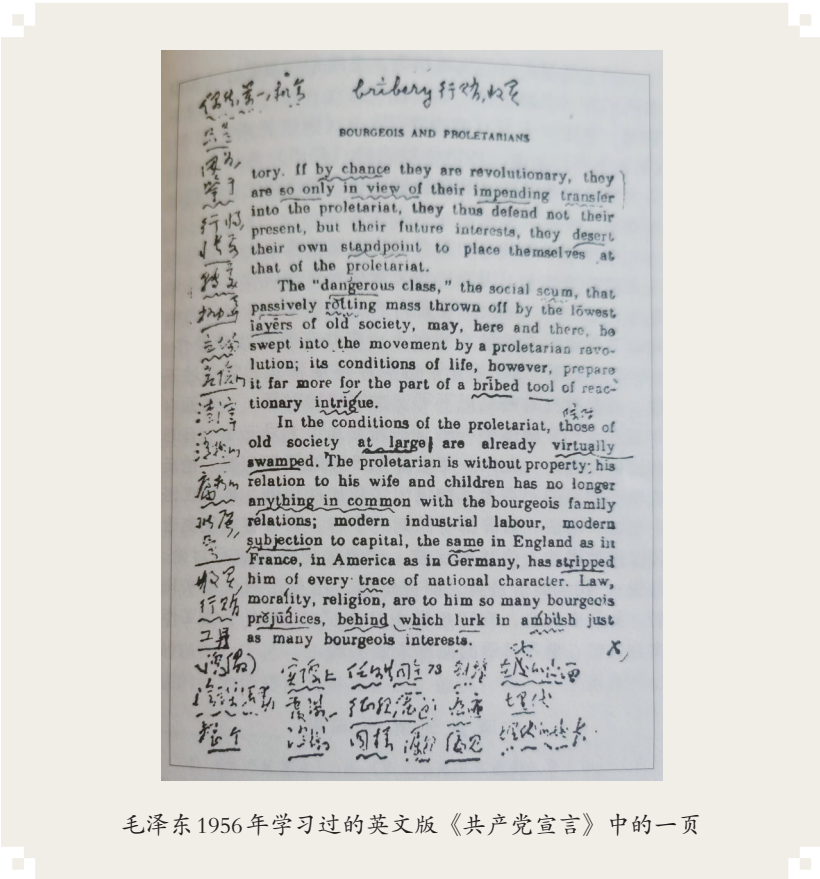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自学过英语。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学习受到很大限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善和做好国际国内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毛泽东更加重视挤时间学习英语，阅读大量英文参考资料。毛泽东阅读英文资料，一方面是为了广泛地了解和研究各国人民革命和斗争的历史，为决策、谋划、处理国际事务服务；另一方面他还把阅读英文资料当作调节大脑的独特方法，一种书看久了就换另一种书看，从而使自己高度运转的大脑得到休息。

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写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细想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斯诺禁不住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起来，并在后边再打了两个感叹号。这个小故事记载了毛泽东当年自学英语的一条习惯做法，把要记的单词、短语用类似读音的汉字标注在旁边，这样一看注写的汉字就知道了这个单词或短语的读音了。毛泽东这个学记英语单词的独特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晚年的岁月。

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译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朗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从此，在英文里就多了一个paper-tiger的复合词汇，并且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时隔20多年，1973年2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会见基辛格。谈话中，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

毛泽东学习英语背后的战略眼光

□ 徐中远



毛泽东1956年学习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页

吗？”毛泽东予以否定：“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 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宾主都大笑起来。

笔者在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工作中知道，毛泽东晚年每天喜欢看新华社编印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爱看国家外文局编印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等等。他每天用心钻研学习这些英文书刊资料，如同每天看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参考消息》一样，重要的是为了更多地、更全面地了解国际情况和国际动态，为了更好地学习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知识，把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各项文化做得更好。毛泽东看这些英文资料，除了看有关各国的重要新闻报道文稿外，对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传记、演说、谈话等书刊也饶有兴趣。他说，这些书刊里写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

毛泽东善于从多种中英文书刊参考资料上了解许多国家的历史文化、军事科技的情况，学习掌握的丰富国际知识，常常使得一些著名的外国记者为之惊讶。1960年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毛泽东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毛泽东虽然出国不多，也没有去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但是，他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和把握都是很准确的。这同他经年累月、一天也不间断地阅读和研究大量国际问题的中文、英文书刊资料和新闻报道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也谈过他与毛泽东一次近一个小

时会见时的情景：他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毛泽东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阅看英文参考资料书刊像读中文书刊一样，爱在所读的书刊资料上圈圈画画，读到重要之处，他总是习惯用红铅笔或黑铅笔在有关的文字旁画上粗粗的着重线或圈圈点点；在有疑问处则打问号或写出质疑；发现有差错还认真地加以校正；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他还做眉批旁注，并推荐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或身边工作人员阅读。如1958年9月24日下午版《参考资料》有20篇文章中做了眉批旁注，在有关的报道中画了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和杠杠线线。毛

泽东对一些有助于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对立面意图的有关报道，常常批示有关报刊转载，或者印发有关人员参阅。比如，1950年12月28日，他批示“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将《参考资料》上刊登的杜勒斯的两篇演说和美国“新教领袖们”通过的一个声明等三篇报道亲自重拟标题、重写提要，批示印发给与会中委阅读。

毛泽东在学习英语时还经常纵论国际形势。他注重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对未来表现出明晰的预见性。1957年12月12日，在戴高乐当政之前5个月，毛泽东就非常注意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他说，要继续进行观察。1958年戴高乐当政时，国际大多数與

论认为，欧洲的政局将向右转。但毛泽东明确认为，戴高乐当政有利于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晚年的岁月里，毛泽东阅看很多的英文、中文资料，不仅为他了解掌握许多新情况新信息、增加许多新知识，而且成为他作重大决策的重要参考“教材”和重要“依据”。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当时中央为解决台湾海峡关系问题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时强调指出：“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内部资料《参考资料》——引者注），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方向，不然怎么决策？”

1962年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第5406期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这一重大决策，对当时中印边界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也早已注意。1968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书“写的不错”。1969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这些举措，对改善后来的中美关系、对推进尼克松访华等中美间的几件大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0年12月19日下午，毛泽东对

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哪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交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们在毛泽东圈画过批注过的英译本书籍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批判》，还有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译本。《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是毛泽东生前最爱读的，读得时间最长、读得版本最多的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英译本也是毛泽东晚年读得最多、批注最多、版本最多的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说到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林克在《忆毛泽东学英语》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毛泽东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泽东不畏困难。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语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他对我也说过，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还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笔者在服务工作中也看到过，毛泽东读过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从头至尾在版心文字天头、地脚与左右两边空的地方几乎都写满了批注的文字，其中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在读的过程中，对书上的英文单词和短语还不很熟悉或者还没有记住的，他就用铅笔标注出来。当再次阅读的时候，认识的、已经记住的词和短语就顺利过去了，一时还没记住、还没认识的英文单词或者短语，一看写的汉字批注，就即刻回想起来了。这是他晚年学习英语自然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习惯。在版心每行英文下面还画上了不少的浪线、曲线、横直线等多种符号。从这些所画的种种符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学习英语是很刻苦、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的。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多种疾病缠身的岁月里，还在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英语，其行动和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作者系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

血洒中州
气壮山河

——河南省开封市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李一凡



在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东郊乡百塔村南，坐落着1952年始建、1975年迁建于此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开封市烈士陵园。步入陵园，碑亭庄严、浮雕肃穆、苍松挺拔，革命烈士纪念碑于宽阔的纪念碑广场之上巍峨耸立、直插苍穹。纪念碑于1988年建成，碑高27.2米，主碑为五棱柱体，碑座由开封市的市花——菊花图案构成的花环所环绕，在“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镏金大字上面为红色大理石雕饰的红五星，下面是红色花岗岩雕饰的葵花向阳花环，全碑俯视成五角星状。纪念碑后的浮雕墙上镌刻着《碑文》，全文如下：

古城开封，地处黄河之滨；文化璀璨，造就无数英雄。
近百年来，开封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

争，连绵不断，前仆后继。
辛亥革命，河南义举。志士仁人，忠魂长存。

五四运动，各界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亲临古城，传播革命火种。一九二五年六月，中共开封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运动蓬勃兴起。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革命英烈，威武不屈，面对屠刀，殒身不恤。
日寇侵华，开封沦陷。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屡建奇功；豫东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血洒中州，气壮山河。

抗战胜利，蒋介石发动内战。开封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震撼中原。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浴血奋战，势崩雷电，歼敌三万余人，首克开封。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开封再度解放。浩气英风撼天地，彪炳功业贯千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许多优秀儿女继承革命传统，保卫祖国，建设开封，丹心照日月，碧血化长虹。

值开封解放四十周年之际，全市各族各界为缅怀革命先烈，捐助集资，馨香祷祝，建成革命烈士纪念碑，以昭烈士之丰功伟绩。

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
开封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十月

碑文记述了开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赢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胜利，在新中国成立

后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光辉历史。敬读碑文，对革命烈士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古城开封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河南工运、农运、军运、学运的中心。在大革命时期，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曾两次来到开封。1924年12月下旬，受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邀请，李大钊首次来到开封。经过积极争取和多方工作，胡景翼允许国民党与共产党公开和半公开活动。1925年，李大钊再次来到开封。8月初，在当时的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的六号楼三楼大教室，李大钊以《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为题，向开封各校学生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提出了“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三大口号，勉励大家积极投身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8月6日，由中州大学学生记录的《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在《雷火》周刊上发表，成为在河南留存的李大钊珍贵文献之一。革命的火种在中原、在中国大地点燃，激励着革命青年前仆后继。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开封的活动转入地下与敌继续斗争。1928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李鸣岐在开封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用编写传唱革命歌曲的方式进行斗争。1929年夏，中共河南省委利用国民党内部军阀矛盾，积极营救被捕的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李鸣岐获救出狱。1931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鸣岐再次被捕。敌人从李鸣岐身上搜出了党的文件，将其列为要犯。当时，面对敌人大批残杀共产党人的情况，李鸣岐与同在狱中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曾斯

延等人研究决定组织越狱。4月中旬，党组织派人准备了3把钢锉，通过秘密通道传入狱中。李鸣岐指挥大家互相掩护，把各自的脚镣铐断，做好越狱准备。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掌握了此次行动计划。4月30日清早，敌人突然到狱中大搜查，钢锉等被全部搜出。5月9日，在一声声“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李鸣岐与曾斯延等人被枪杀于开封北门外刑场，壮烈牺牲。

1938年冬，胡万杰、郭向新夫妇经朋友介绍从北平来到开封。1943年，胡万杰结识了地下党组织——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站长郭有义。从此，他们夫妇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开封沦陷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胡万杰夫妇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党的地下交通、收集各类情报、安全接送很多同志进出开封。1947年4月中旬，已经暴露的胡万杰夫妇为了赢得了必要的时间以确保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主动与敌人周旋，相继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诱骗、软化等伎俩，他们坚贞不屈，展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1947年12月底，胡万杰、郭向新夫妇英勇就义。

解放战争期间，开封是解放军在关内首次攻克的山省城市。当时开封城防名义上由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刘

茂恩指挥，但正规军却又归第66师师长李仲辛指挥，内部矛盾重重。华东野战军首长粟裕在分析敌我双方形势后，决定迅速发起开封战役。1948年6月17日晚，攻城战斗开始。在华野3纵的猛烈攻击下，防守曹关和宋关的国民党兵很快溃散。19日凌晨，9师21团在炮火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宋门城门被炸开一个大洞，突击队员蜂拥而入。8纵的爆破组午夜突破南门，但突破口被守军火力封锁。8纵组织爆破突击队连续爆破了11次，终于炸毁了南门城门，后续部队与国民党守军激战数小时，巩固了突破口，大部队冲进了开封城内。20日晚，李仲辛率残部撤至城西北角的龙亭等地负隅顽抗，刘茂恩下令放火燃烧省政府周围的学校民宅“照明”。蒋介石见开封陷落在即，乘专机亲临开封上空督战，还命令国民党空军大肆轰炸。但解放军将士毫不畏惧、猛冲猛打，消灭了城中国民党残部，李仲辛也被击毙，刘茂恩化装逃跑。6月22日，开封首次解放。为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军后来主动撤离开封，挥师东进。同年10月24日，我军再次收复开封，开封迎来第二次解放。开封战役中，涌现出包括吴玉征在内的无数革命战士，他们为全国的解放事业谱写出永垂千古的壮丽篇章。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